

罗平汉 著

中央苏区时期

党史现场①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党史现场①

中央苏区时期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党史现场①: 中央苏区时期/罗平汉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7-211-06708-4

I. ①党… II. ①罗…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党史—
1927~1934 IV. ①D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79557 号

党史现场①: 中央苏区时期

DANGSHI XIANCHANG ZHONGYANG SUQU SHIQI

作 者: 罗平汉

责任编辑: 林俊杰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福建省天一屏山印务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闽侯县永丰村

邮政编码: 350101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36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708-4

定 价: 33.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朱毛之争与古田会议/001

一、争论的起因：军委该不该设/001

1. 红四军军委“停止办公”/001
2. 刘安恭的到来与军委的重设/005
3. 下级作出限制上级权力的决定/008

二、临时军委的取消与中共红四军七大/021

1. 白砂会议决定取消临时军委/021
2. “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026
3. 中共红四军七大毛泽东落选/032

三、中央“九月来信”与古田会议的召开/044

1. 陈毅的汇报与中央“九月来信”/044
2. 毛泽东回到红四军/050
3. 古田会议成为永恒的历史记忆/055

富田事变与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066

一、富田事变前赣西南的反 AB 团问题/066

1. 赣西南中共组织对 AB 团的最初认识/066
2. 反 AB 团活动一开始就出现扩大化/069
3. 对 AB 团问题的估计越来越严重/072

二、前委、特委间的分歧与富田事变的发生/076

1. “二七”会议与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076
2. 赣西南“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081
3. 乱抓滥捕 AB 团诱发富田事变/086

三、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定性的变化/101

1. 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最初定性/101

2. 共产国际：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活动”/106

3. 中央苏区新一轮的肃 AB 团高潮/113

四、周恩来为抑制肃反扩大化的努力/115

1. “过去我们对于 AB 团的认识太笼统了”/115

2. 周恩来采取措施纠正“扩大化”/119

3. 根据地肃反扩大化原因探析/122

宁都会议前后毛泽东与中共临时中央的关系/134

一、打不打中心城市之争/134

1. 毛泽东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134

2. “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141

3. “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147

二、宁都会议毛泽东失去兵权/156

1. 前后方关于军事行动的分歧/156

2. 宁都会议作出决定：毛泽东暂回后方/163

3. 毛泽东为何在宁都会议上遭排挤/168

三、“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174

1. 博古反感称毛泽东是“最好的领袖”/174

2. “项庄舞剑”式的反“罗明路线”/177

3. 因查田运动纠偏毛泽东再受打击/179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为何失败/190

一、蒋介石“围剿”战略与战术的转变/190

1. 用政治与军事两手展开“围剿”/190

2. 鼓吹“攘外必先安内”以鼓士气/194

3. 吸取以往教训采取步步为营之策/197

4. 举办军官训练团提高作战指挥能力/201

二、军事战略与战术的严重错误/206

1. “两个拳头打人”未消灭敌人有生力量/206

2. 擅长运动歼敌的红军遇到新难题/209

3. 以堡垒对堡垒的“短促突击”/212

4. 命令主义使前线指挥员不能临机决断/217

三、对福建事变处理失当致使良机错失/223

1. 福建事变的发生与中共临时中央的最初反应/223

2. 采取“左”的政策坐视福建人民政府垮台/226

3. 拒听正确建议丧失反“围剿”的有利时机/228

四、“左”倾政策严重影响红军战斗力/230

1. 肃反扩大化和查田运动的“左”倾政策为丛驱雀/230

2. 不顾实际的“扩红”致使兵源素质下降/234

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反“围剿”的沉重包袱/238

朱毛之争与古田会议

1929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即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中共建党建军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之所以召开这次会议，又与此前红四军内部在如何建党建军问题上，曾发生的一场争论密不可分。过去一段时间，出于为尊者讳的缘故，相关党史著述写及古田会议时，对于这场争论的介绍常常是语焉不详。近来这种现象有了改变，甚至有专门的著述对此作了全面回顾^①。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段历史再略作个人的分析与判断。

一、争论的起因：军委该不该设

1. 红四军军委“停止办公”

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军，在江西宁冈县的砦市会师。两军会师后，在砦市的龙江书院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根据中共湘南特委的决定，两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由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朱毛红军”由此而来。接着，又召开中共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以毛泽东为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的第四军军委。同年5月下旬，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成立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任特委书记。随后不久，第四军军委进行改选，由陈毅任军委书记。

这年6月26日，中共湖南省委给红四军（1928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规定各地工农革命军改称工农红军）发来指示信，要求取消红四军军委，另成立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指挥红四军与湘南党务及群众工作。中共湖南

^① 如蒋伯英所著《1929：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就对这段历史的研究甚详且作了客观评价。

省委还指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兵士一人、湘南农民同志一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毛泽东、朱德、龚楚为常委。至于毛泽东此前所任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一职，则由中共湖南省委派来的杨开明继任。

7月中旬，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派来红四军的代表杜修经坚持省委决定，要求红四军去湘南活动，红四军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将军委改称为前委，因毛泽东在永新，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会后，前委指挥红四军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个团（原湘南起义部队）前往湘南郴州；毛泽东以党代表名义指挥第三十一团、第三十二团留在井冈山。7月下旬，前往郴州的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其中第二十九团几乎全部散失。8月23日，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在湖南桂东与朱德、陈毅率领的第二十八团会合。当晚，红四军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重返井冈山，并取消前委，另行组织行动委员会指挥部队行动，以毛泽东为书记。

此前的6月4日，中共中央致信朱德、毛泽东及红四军前委，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并指出：“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由此可见，红四军前委不但是军中党的最高领导机关，还负领导根据地的党组织之责。信中还提出，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湘赣边界工农武装割据各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至于前委同江西、湖南两个省委的关系，中共中央要求“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①。

朱、毛收到中共中央这封信时，已是11月2日。11月6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共中央6月4日的来信，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重新成立红四军前委，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地

^① 《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年6月4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56—25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方党部书记)、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五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11月14日至15日,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23人组成军委,由朱德任书记,陈毅改任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当时,红四军前委和军委的书记都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军委隶属于前委。

1929年1月,红四军前委在宁冈县的柏露村召开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常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和红四军、红五军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彭德怀率红五军留守井冈山。2月初,红四军到达湘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山区时,前委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此次会议鉴于部队行军打仗和军情紧急,为了减少领导层次,决定“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由前委直接领导军内各级党委,朱德的军委书记一职也暂时停止。^①也就是说,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流动游击的情况下,前委所能领导的实际上只有军队,这确与军委的职责重叠,故有取消军委的必要。对于这个情况,同年9月陈毅在向中共中央报告红四军的党务工作时也说:“四军出发赣南,前委在事实上随军走,所以只能管军队,至多连(达)到某地作一点巡视地方党的工作,同时军队每日行动均须决定,因此觉得军委前委发生重复,遂将军委停止职权,由前委直接指挥两个团委,及特务营委及军部特支,颇觉便利敏捷,同时前委权力超过特委军队行动脱离了地方主义的束缚。”^②

这年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朱毛红军撤离井冈山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由于当时对红四军的情况不很了解,自中共六大组成的新中央回国后,半年内几次派人送信给朱毛,但始终未能联系上,中共中央对此“莫不胜焦念”。红四军撤出井冈山在赣南一带游击的消息,中共中央是从报纸上的报道中得知的。为此,中共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下,红四军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割据局面,部队应分散活动,朱德和毛泽东应当离开红四军,以减少敌人的目标。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封信给红四军。此信史上称之为中央“二月来信”。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新编本)上,第1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②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1929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72—77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二月来信”的全称，是《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信中强调：“目前党的主要工作在建立和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主要的是产业工人支部）与领导工农群众日常生活的斗争和组织群众。”“因此，你们所领导的武装力量也宜在这一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前面重新下一责任的估定。中央依着六次大会的指示，早就告诉你们应有计划地有关联地将红军的武装力量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中共中央要求红四军“在适宜的环境中（即是非在敌人严重的包围时候）可能的条件下（依照敌人的军力配置和我们武装群众的作战能力与乡土关系）”，将武装力量分编散入各乡村去。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最多不要超过五百人。“这些分编的部队必须互有联络互相策应，且须尽可能地散在农民中间发动农民的日常斗争走入广大的土地革命。”^①

来信还要求朱、毛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并且说：“两同志在部队中工作年余，自然会有不愿即离的表示，只是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在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朱毛两同志离开部队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因为朱毛两同志留在部队中目标既大，徒惹敌人更多的注意分编更多不便；一方朱毛两同志于来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贡）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的决定后，不应囿于一时群众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艰苦的责任，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②

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4月5日，中共红四军前委召开会议，对此进行讨论。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所讨论的情况给中共中央复信，认为“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

① 《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1929年2月7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4—3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② 《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党的军事策略》（1929年2月7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了”，不赞成将队伍分散到农村游击和朱毛离开红四军，强调：“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①

2. 刘安恭的到来与军委的重设

随后，中共中央不再坚持朱毛离开红四军，也没有将朱毛认为能“胜过”他们的刘伯承和恽代英派来（刘伯承后来到了中央苏区，但已是1932年1月的事了），而将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刘安恭派来了。

刘安恭是这年5月上旬来到当时红四军的驻地宁都的。刘安恭是四川永川（今属重庆）人，1918年赴德国留学，第二年在比利时加入共产国际。在德国期间，刘安恭结识了朱德、章伯钧等中共旅欧支部的成员，“共同的追求、共同的理想，使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②。1924年，刘安恭回国后，被派往四川军阀杨森部做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杨部参谋和成都市电话局长。不久，杨森在四川军阀混战中被逐出成都，移驻川东万县，杨森让刘安恭署理兵运事务，为自己招兵买马。1926年8月，朱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前来万县做杨森部的统战工作，与刘安恭再次相遇。同年9月“万县惨案”发生后，刘安恭因策动杨森部一个团易帜，遭杨通缉而潜往武汉。不久，朱德也离开杨森部队去了武汉。1927年初，朱德在南昌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任团长，刘安恭任副团长。刘安恭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前往苏联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初，刘安恭从苏联回国，随即被中共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前往红四军工作。

刘安恭在苏联学习过军事，又是中共中央直接派来的，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到来自然很重视，于是红四军前委决定恢复2月初曾“停止办公”的军委，并由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同年6月1日，毛泽东给中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7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② 参见赵广瑞：《红四军领导人刘安恭因“托派”埋名》，《炎黄春秋》2000年第2期。

共中央的报告中，曾这样说：“去年十一月以前全军有军党部，十一月的中央指示后，组织比前妥。前委设军委管辖前委的各级党部（团委营连委支部）兼及地方赤卫队，前委于指导红军之外还有对地方党部指导。今年一月四军从湘赣边界出发向闽赣边境，每日行程或作战，在一种特殊环境之下，应付这种环境，感觉军委之重迭，遂决议军委暂时停止办公，把权力集中到前委，前委直接指导之下组织委员会。现在因时间开长而发达（原文如此，引者）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遂决定组织军的最高党部，刘安荣（恭）同志为书记兼政治部主任。”^①

报告中所言重新恢复军委，主要是“因时间开长而发达红军数量比前大增，前委兼顾不来”，固然也是事实。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起初在赣粤边境的大余、信丰一带活动并不顺利。后来陈毅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一月十四日，四军军部率二十八，三十一两（团）及一特务营出发赣南游击，企图击破湘赣会剿，一月二十八日与赣军三团战于大庾，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累积重迭于一线致失利，我军引退折回粤边南雄界，取闽粤赣边界转至吉安兴国一带，沿途皆两省交界，红军没有群众帮助，行军宿营侦探等事非常困难，敌人又有样轮班穷追（原文如此，引者）政策，我军为脱离敌人，每日平均急行九十里以上，沿途经过山岭（岭）皆冰雪不化困苦加甚，复于平顶坳、崇仙圩、圳下、瑞金四地连战四次皆失利，枪械虽未有大的损失，但官（兵）经过三十日左右之长途急行军已属难支。”^②

不过，到了2月之后，红四军的情况有了改观。2月9日，也就是农历除夕这天，红四军在江西瑞金的大柏地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消灭了一直尾追的国民党军独立第七师（师长刘士毅）的两个团大部，俘敌团长以下800余人。随后，进占宁都县城，并在李文林等人创建的东固根据地休整了一个星期。3月中旬，攻占福建长汀县城，歼敌2000余人，缴枪500余支，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68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②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1929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54—75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击毙敌旅长郭凤鸣。红军还在这里利用缴获的敌人被服厂，赶制了4000套军装，这是红四军自成立以来第一次有了统一着装。占领长汀后，红四军回师赣南，在宁都、瑞金、兴国一带活动，建立三县县级革命政权。5月，红四军第二次入闽，攻占龙岩、永定等县城。

在这个过程中，红四军自身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这年6月1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第四军一二三纵队由大庾失败退到赣南时人数由三千六百，减至三千，计损失六百（内有百余名受伤与病，现在东固疗养实际损失二百）。六日都（此处可能是指宁都，大柏地位于宁都瑞金两县交界处，但属于瑞金，引者）大柏地对刘旅一战幸已补充，但因没有兵提，将所有之枪给江西红军第二团去。三个月来，人数增加一千六百，枪数增加五百（汀州宁都龙岩坎市四役共得枪八百支，三百多等坏些的发给地方赤卫队去了），连原有共计二千。”“现在计在前委管辖下与前委有发生关系的共有三个部队，一是四军一二三纵队，枪二千，这是主力，二是湘赣边界部队有枪一千四百，三是江西第三（二）四团枪一千，共计四千五百枪。这三部分大体说都可说是有着相当的战斗力的正式军队，都是从最困难的反革命高潮下创造出来的。”^①

从毛泽东的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大柏地战斗之后的几个月，红四军确实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增加了一千多兵力，并且配合地方党组织建立了几个县的革命政权，但这恐怕不是恢复军委的全部理由。更重要的是，刘安恭来头大——中共中央直接派来，而且又有国际背景——曾在苏联学习，自红四军创立以来，有此身份和经历者还未曾有，所以朱毛对刘的到来十分重视，先让刘担任军政治部主任（这一职务原本是毛泽东兼的），后又于5月23日攻占龙岩城后，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由刘担任军委书记。一时间，刘成了红四军内仅次于朱毛的第三号人物。

时下一些人对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此间设立临时军委之事颇有微词，意即毛泽东实际上在红四军搞个人专断，军委书记这样重要的职

^① 《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6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68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务，他想取消就取消，他想恢复就恢复。笔者认为，这件事恐怕与毛泽东搞个人专断难以直接挂上钩来，很大程度上是因人设事的需要。因为刘是中央下派的“钦差大臣”，又有在莫斯科啃过洋面包、喝过洋墨水的背景，在那个全党对苏联普遍崇拜的年代，凡是从莫斯科回来者多少都带有神圣的光环。现在刘安恭来了，如何给他在红四军内安排一个合适的职务，是毛泽东为首的红四军前委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再则，当时党内民主气氛浓厚，以至于后来的中共红四军七大上，毛泽东在选举中曾一度落选，故而当时的红四军并不具备个人专断的环境。

朱毛之争虽然发生在1929年夏天，但实际上离开井冈山之后，红四军内部在一些问题上，就已产生了意见分歧，由于当时“处境困难，屡遭挫折，于是，红四军内部，包括高级领导干部中，对井冈山时期以及下山后的一些政策和做法产生了各种议论。对红军中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军事和政治的关系、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等问题，争论更一直不断”^①。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后，这些争论又逐渐发展到基层。而刘安恭的到来和这个临时军委的设立，进一步加剧了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并且涉及毛泽东和朱德，也就是史上所说的“朱毛之争”。

在“朱毛之争”中，刘安恭自然是一个关键人物，有的著述中甚至说在这场争论中，他和林彪“起了很坏的作用”。刘与林彪的一些言行，使争论得以激化固然是事实，但如果将这场“朱毛之争”的责任都归结到他们两人身上，似乎将历史简单化了。

3. 下级作出限制上级权力的决定

引发“朱毛之争”的，其实并不在于是否设立临时军委，而是前委与军委之间的职权如何划分。其导火线是刘安恭担任军委书记一职不久，就作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曾经历过这场争论的萧克曾在《朱毛红军侧记》一书中回忆说：“问题就出在新组织的军委。刘安恭在军委会讨论工作时，对上级机关——前委作了条决议，‘前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传》，第175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① 时任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的江华也在其回忆文章中说：“他（指刘安恭，引者）刚由苏回国不久，不了解中国红军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并在他主持的一次军委会议上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这个决定限制了前委的领导权，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显而易见，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是不利于革命斗争的，自然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这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即存在的关于红军建设问题又开始议论起来，一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颇有表露。”^②

刘安恭主持的军委作出这样的决议，显然是违背中共中央精神的。当时中共中央在关于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前委不仅领导所在红色区域的地方工作，而且是在前委之下组织军委，也就是说军委是前委的下级组织。现在作为下级的军委竟然对其上级前委作出限制性的决定，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对此不满，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问题在于以刘安恭为书记的军委能作出这样一个决定，似乎并不完全是刘个人所为。他初来乍到，对于红四军可以说是人地两生，虽然有“钦差大臣”的身份，但这样一个决定的作出，至少说明军内负责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此决定是赞成或者同情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朱毛之争”表面看是前委与军委之争，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简单。

对于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传（1893—1949）》是这样论述的：“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军的环境相当艰苦。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这时，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红四军工作，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这就促发了红四军党内关于建军原则的一场争论。”^③

①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8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江华：《关于红军建设问题的一场争论》，《党的文献》1989年第5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200—20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可见，这场争论所涉及的，并非只是前委与军委的职权划分问题，也并非刘安恭来后才发生的，只不过是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加剧了这场争论而已。

1929年9月，陈毅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提到这个问题。他说：“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中是有相当的尊重的，尤其军队的习惯，一班，一排，一连，一营，一团，生活各为一集团，农民的自私关系，自然要划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团体主义的色彩就很浓重，各团为各团争利益，如（各）营为各营争利益，各连为各连争利益，如枪弹人员之类则主张自己要多，如担任勤务则主张自己要少一点，尤其各连还有同乡关系，广东人，湖南人，北方老乡，他们总是情投意合，分外不同，遇有病痛，以这一类人为最能帮忙自己的。”^①当时，红四军中下级干部有这种“小团体”主义，军中高级干部的情况如何，陈毅在报告中没有提及，恐怕很难说一点也没有。

还应该看到，红四军虽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但毕竟有相当部分是由原来的国民革命军脱胎而来。在国民革命军中，虽然也有党代表制，有政治工作人员，但党代表与政治工作人员在军队中的地位与作用，与红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某种程度上，红军中的党代表和政治工作人员的地位或许还要高出同级军官，这就难免使一些军官不习惯。陈毅在报告中同样提及这个问题。他说：“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恍惚是国民革命军旧习一样，前委为根本解决这个问题，特考查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可以有四个方式：一个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平等（结发夫妻式），结果天天要吵嘴。二，把政治工作人员权力只限于政治训练，这样军官权力过大，政治人员会变成姨太太。三，照江西红军二四团的办法，军官须听命于政治工作人员，这样成了父子式了。四，军官与政治人员平等，由党内书记总其

^①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1929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76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成，一切工作归支部，这样可以解决许多纠纷，划分职权，但这要许多人材了。”^① 其实，红四军内部发生这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新型人民军队在初创时期难以完全避免的。

但是，刘安恭的到来加剧了这场争论，用《毛泽东传（1893—1949）》所说的“促发”倒也贴切。刘的第一“促”，就是作出了前委不能讨论军事的决定，这就涉及前委与军委的关系问题，不难理解他的这一决定是针对毛泽东的。刘与毛泽东没有任何的历史关系，而刘与朱德可以说不但是同乡，而且是相识多年的旧友。革命当然没有地域之别，革命者也应当是以党的事业、革命大局为重，不能有旧时代的同乡关系，但革命毕竟是在中国进行的，中国旧有的习俗（如重乡谊之类），不可能在革命者身上一点也不发生影响。

我们现在当然无法确认刘与朱、刘与毛之间的私人情谊有什么样的区别，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毛泽东对刘安恭的印象始终不佳。

1936年夏秋，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到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的情况时说，这时“红军在物质上和政治上的情况都有了改进，但是还存在着许多不良倾向”，“1929年12月在闽西古田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大会讨论了改进的办法，消除了许多的误解，通过了新的计划，这就为在红军中提高思想领导奠定了基础。在这以前，上面所说那些倾向是十分严重的，而且被党内和军事领导内的一个托洛茨基派别利用了来削弱运动的力量。这时开展了猛烈的斗争来反对他们，有些人被撤销了党内职务和军队指挥职务。刘恩康（应为刘安恭，引者）——一个军长（应为军委书记，引者），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据揭发，他们阴谋在对敌作战时使红军陷入困境而消灭红军。”^② 说刘安恭是托派当然不是事实，刘也没有要“消灭红军”的阴谋。当然，这些话为斯诺所记，难免与原意有所差异。尽管如此，说明毛泽东对刘安恭确有很深的成见。

事隔多年，毛泽东对刘安恭的印象仍旧没有什么改观。他在1961年3

①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1929年9月1日），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73—77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

②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14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